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本期焦点：界与跨界

睦邻的交易：中越边境上的小规模贸易及相互认知的型塑

恩迪斯

亲密的边界：西南中国的感官王国

周雷

生活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跨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及其制约

奈仓京子

脱离「韩国人外籍配偶」身份的女人

文敬渊

新经济精英：地方权力的社会基础

古德曼

中国与危机：近来西方中国话语的分析

史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HINA STUDIES **No.17**



周晓虹
谢曙光 / 主编



中国研究

2013年春季卷总第17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研究. 2013 年. 春季卷: 总第 17 期 / 周晓虹, 谢曙光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097 - 5505 - 1

I. ①中… II. ①周… ②谢… III. ①社会发展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 丛刊 IV. ①D668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231 号

中国研究 (2013 年春季卷总第 17 期)

主 编 / 周晓虹 谢曙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胡 亮

责任校对 / 李孝珍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505 - 1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5.75

字 数 / 280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面题字：金耀基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音序排列为序）：

Anagnost, Ann（美国华盛顿大学）
Christiansen, Flemming（英国利兹大学）
Duara, Prasenjit（美国芝加哥大学）
范可（南京大学）
风笑天（南京大学）
Friedman, Edward（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关信基（香港中文大学）
Houlden, Gordon（加拿大爱尔伯特大学）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加加美光行（日本爱知大学）
金光亿（韩国首尔大学）
李路路（中国人民大学）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强（清华大学）
李友梅（上海大学）
林南（美国杜克大学）
刘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马戎（北京大学）
Mohanty, Manoranjan（印度德里大学）
Perry, Elizabeth（美国哈佛大学）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
Stafford, Charles（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Unger, Jonathan（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Vogel, Ezra F.（美国哈佛大学）
汪晖（清华大学）
王庚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谢寿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阎云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园田茂人（日本东京大学）
翟学伟（南京大学）
张玉林（南京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周怡（复旦大学）

主编：

周晓虹 谢曙光

编辑部主任：

周培勤

编辑：

杨渝东

陆 远

周海燕

秦 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 刊 词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 1949 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 1978 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 19、20 和 21 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

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入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 年 5 月

目 录

发刊词 / 1

主题研讨：界与跨界

界与跨界：一种导读 杨德睿 / 1

睦邻的交易：中越边境上的小规模贸易及相互认知的型塑 ... 恩迪斯 / 6

亲密的边界：西南中国的感官王国 周 雷 / 18

生活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跨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及其制约 奈仓京子 / 35

脱离“韩国人外籍配偶”身份的女人
——中国汉族女性在韩国离婚的个案研究 文敬渊 / 54

学术论文

新经济精英：地方权力的社会基础 古德曼 / 67

中国与危机：近来西方中国话语的分析 史 明 / 88

家庭形态的想象与重构：一个分析性框架
——1949 年以来的国家权力实践 董国礼 谢燕清 / 109

下岗中的性别化逻辑：体制变革与身份认同重构
——以上海一家食品企业为例 唐晓菁 / 138

国家政权建设与劳模制度的地方实践

——基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山西地区的初步考察 邢宇宙 / 152

红色旅游中的历史展示

——对沙家浜景区的个案考察 吴心越 / 177

合作社中的复合型差序格局 李 宽 戴纯青 杨 君 / 199

书评与随笔

中产阶层家庭中“亲密的陌生人”

——评孙皖宁《中国保姆：媒体、道德和边界的文化政治》

..... 周培勤 / 219

“中国模式”需要华丽转身

——评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 杨书胜 / 229

英文目录与摘要 240

稿 约 246

界与跨界：一种导读

杨德睿*

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将注意力摆在被框架起来的、有某种边界的（不论它有多么模糊难辨）空间之内，而非边界本身。尽管我们确实常会从描画其边界开始去把握一个空间，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只在边界上留驻很短暂的时间，随即就转向空间内部。这种普遍的认知惯习（habitat）鲜明地反映在迄今为止仍占主流位置的、相当古典的民族志书写风格上：一本上百万言的大部头民族志，往往也只有最开头的那几页简短地划出这本书的“民族志现场”的边界，之后就全是描述（边界内部的）这个空间里面发生的种种情况、这个空间的性质特征等，比如埃文思－普里查德的经典巨著《努尔人》（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就是著例。的确，在“部落/村落人类学”于 1960 年代开始被批判以后，出现了重视“部落/村落”这类过去被想象、表述为封闭自足的空间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潮流，于是，各个空间单位渐渐不再被想象成一个个台球，而是被各种纽带或链条穿透、串联起来的珠串汇合而成的珠网。这些珠网可大可小，例如从施坚雅为中国社会建构的“以市场为中心的跨村落区域体系”（施坚雅，1998）这种最小的，经过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依赖理论这种中型的，一直到沃尔夫（2013）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所呈现的“全球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这种最大号的珠网。但无论如何，注意力的焦点除了“空间单位内部”这个传统的延续外，新加入的也不外乎“内/外的互动交流”和“联通各单位的纽带”这两个方面。换言之，人员、财货、信息等事物在各空间单位之间的旺盛流动以及这些流动对每个单位内部的影响，成了更新版的主导认知图示（schema），它是上述一般认知惯习的承续发

* 杨德睿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yangdr@nju.edu.cn）。

展而非批判，因为它依然倾向于匆匆掠过把那些空间单位框架起来、让它们成为空间单位的那个更基本的东西——边界。换言之，我们很关注珠子和珠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把它们串成网子的线，但是很少去想让珠子成为珠子的那个球形表面——珠子的内外边界。

珠串或珠网的意象可以是空间性的隐喻，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一般来讲，在整体文化氛围倾向于保守的时期，在面对时间和社会这两个存在向度时，人们的注意力趋向也可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在历史向度上，人们倾向于以时间（或世代交替，或生命周期，或政权的“法统”“正朔”）为引线，审视一个个时间段（时代）的性质，并且比较、推论这些时间段的性质间的关系；在社会向度上，人们倾向于以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模型为引线，审视一个个社会范畴的性质，并且比较、推论这些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但是，相较于在空间向度上的思考，人们在面对历史和社会时，对于“边界”显然要更敏感、更注意，特别是在整体文化氛围倾向于变革的时期：战争和大发现、大发明之类划时代的事件总能在集体记忆中占据突出的位置，而社会分层与流动也一向是社会科学和文艺作品历久不衰的主题，反映出人们因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始终不能释怀的羡慕、嫉妒、恨。

不过，虽然人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边界比对物理空间的边界更敏感，但是也正因为这个敏感性，人们也经常用两种“脱敏”法去抑制它：扭曲和遗忘，这两种脱敏法强度不同但作用一致，都在磨灭边界的任意独断性（arbitrariness）、错乱（insanity）和残酷，让社会和历史看起来仿佛始终是符合正常逻辑的、连续的、绵延的，以符合崇尚和平与秩序的善男信女们对理性和道德的信念。于是，我们有了众多的大叙事，把划时代的界限性历史事件表述成前一个历史阶段的逻辑后果或/和后一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的发轫——也就是“承先启后”这句成语所表达的状态。同样，我们也有众多的社会科学论述，把个人关于社会边界的经验和实践过滤、化约到抽象的政治经济结构上来。换言之，理性用叙事结构或思辨逻辑的结构“驯化”（domesticate）了边界的任意独断性、错乱和残酷。

历史和社会的边界之所以敏感，之所以需要被“征服”和“驯化”，是因为它难以预期、难以驾驭的生杀予夺之力，这种暴力一方面足以爆破承平时代的理性与道德，另一方面却又是后者据以肇造的最初基础。用宗教人类学大师维克多·特纳的话来说，（历史时期和社会范畴之间的）“阈限”（liminality，即边界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反结构”，它既是旧结构、旧角色的终结者，又是新结构、新角色的创生者。而且，重点是它与结构

强烈的负相关：它越反常，也就是与常态的结构、角色、理性、道德背离得越彻底，就越能缔造巩固的新秩序，但是这也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不可收拾的混乱恐怖，好比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所以，“阈限”总是被想象为（用玛丽·道格拉斯的话说）危险的、污染的、需要被严格管制和净化的“城乡结合部”，同时，它又被想象为值得崇拜的神圣之物，是自我身份认同、道德价值、秩序的象征。不仅如此，这种既神圣又危险、既崇高又污秽的悖论性给边界赋予了致命的吸引力，不断撩拨着人们去逾越它的欲望，边界仿佛春药，能让人感觉一切被划到边界之外的、禁止接触的“他者”都变得性感了起来。总之，它是混沌与秩序相反相成的创造性矛盾，并永恒地勾引着人们去逾越。

把在仪式、历史和社会等人类学语境中形成的对“边界”的感性和意识，用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会看到怎样的景象？本专题的四篇论文提供了简明扼要的例证。

本专题中有两篇是关于云南边界的：恩迪斯（Kirsten W. Endres）的《睦邻的交易》这篇文章立足于在中越边界两侧相对的口岸城镇——云南河口/越南老街——所做的田野调查，而周雷的《亲密的边界》一文则是立足于在云南和中缅边境所做的田野调查。这两篇文章清晰地表现出人类学者所看到的国界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一条线，而且是以这条线为辐辏汇聚起来的一组感知、行动、意念和意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张娟已经让我们看到中越边界是一条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的分界线，界线两侧的国家 and 人民用各种不同的叙事和纪念物去重述（扭曲）对那场战争的分歧记忆，不断为这段国界蚀刻上对抗性的意义（张娟，2013）。恩迪斯的文章把我们从不可预期、错乱、残酷的边界记忆中，带到了二十多年之后已经成了人、财、货汇聚的“临街商铺”似的新中越边界。她以老街与河口的跨界商业关系为轴线，描绘出以国界划分开来的不同商业伦理、财税金融体制、文化风尚等，以及如何为两侧的人民搭建起了可资凭借以创造利润的差异格局，而老百姓们则如何凭着日常生活中对这一差异格局的感知和利用，重构着边界和边界另一边的他者的意义。

虽说两篇文章都把地理空间的“客观上的”国界线与关系人的“主观上的”感知、行动、意念和意义熔于一炉冶之，但周雷的取径与恩迪斯却极为不同：在恩迪斯那里，小老百姓的主观世界是被国家政权甚至国际政治结构从上而下律定的客观国界（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建制）制约的，后者才是真正的主体，小老百姓只能在后者定制的鸟笼里展现微末的主体性；但在周雷那里，小老百姓凭借其“主观的”肉体感官以及为满足感官欲望

而来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勾画出了与“客观的”官方版本极为不同的疆界地图。换言之，借着赋予小老百姓更大的相对主体性（相对于政权），“客观的”官方版疆界图也被相对化成了一种主观的建构，而使此思路转换为可能的关键，就在于把被放逐到学术边界之外的感官找回来，让它与理性的一切站在本体论上同等的地位。以这种具有强烈现象学色彩的视角，周雷描绘出了饱含在云南和中缅边境民间饮食与情色文化里的一幅具身性的（embodied）疆域图。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总结：在恩迪斯那里，边界在做生意时的讨价还价之中浮现，而在周雷那里，边界就在人体上——味觉、嗅觉、性刺激等，它随着人体而移动，而且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

在对西南边界走马灯似的意象大观之后，奈仓京子的《生活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和文敬渊的《脱离“韩国人外籍配偶”身份的女人》呈现了低调得多也更精于算计的东方边界。两篇文章谈的都是移民，所叙说的主题也都是国界与婚姻家庭之间的纠葛：正如张娟和恩迪斯指出的那样，国界创造了可资产生利润的差异格局，吸引了人、财、货麇集到它的两侧，最终通过反复的越界来创造利润；而奈仓京子和文敬渊所讲述的故事，就是通过越界以创造利润的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婚姻和家庭的配置。详言之，奈仓京子描述的是赴日留学、工作多年之后回到中国的“海归”，如何通过把家庭成员分别配置在中日两国，以实现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的极大化；而文敬渊则描述了先是进城打工之后离婚嫁到韩国去的汉族农村女性，她们到韩国后又因文化冲突等因素而与韩国配偶离婚，目前正在争取继续留在韩国工作、生活。从某种角度讲，这些长年处于跨界生存状态（奈仓京子称为“跨国主义”）之中的人展现了比周雷笔下的“感官王国”的国民更强大的主体性：他们把真实而非想象的国界变成了为自身家族获利的杠杆，但是，这种利用通信科技来把个人和家庭的存在予以拉伸的做法，肯定造成亲密关系/亲属关系的无体化（disembodiment），那么，若我们承认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基于与亲密的人、物、地方持续不断的对话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若不说是彻底拔根了，至少也是空洞化、虚拟化了的（拉什，2009：40~45）。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要自由自在地逾越（现代国家的）边界，人就必须付出存在状态空虚无体化的代价。这些人活出了“唯有扬弃肉体方能得到主体性的自由”这种斯多葛式的睿见。

总而言之，这四篇文章显示：现代国家之间的地理边界和仪式、历史和社会等语境中的边界类似，它不仅是物理空间中的线，还是人们的记

忆、想象、感知、算计的索引和凭借，更是组织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构筑整个家族长期生涯的实际行动所凭依的纲维。换言之，首先，它的本体不只是物，还是意念、情感和行动。其次，只要稍稍离开“从中心高地俯瞰下面的四周”这种保守的视角，就能看到它不仅是从中心外烁的权力衰竭的边沿，也是元气淋漓的混乱、矛盾，不断诱惑着人们去逼近、逾越。它既是国家主权的终结，也是新生计、新机会的创生之源。最后，它和人身——特别是但不仅限于生物性的感官肉体——的边界存在着突出的换喻关系，云南男性对富有异国风味的食物和越南女人的情色遐想，越南老街女性对中国男人的理想化表述，韩国主流社会以“没有真心、只是拿婚姻当跳板”这种夫妻龃龉的语汇来评论与韩国夫婿离婚后不愿回国的中国女性等，诸多现象都表现出逾越边界、和异在结合的欲望与想要保护边界内的私密领域的正统、纯净欲望之间的矛盾。这种纠结可以幻化成堂皇典雅的国际外交辞令，但身为小老百姓的我们，多半还是用自己的肉体去感知和表达的。

参考文献

- 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玛丽·道格拉斯，2008，《洁净与危险》，黄剑波、卢忱、柳博赞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 霍布斯，2007，《利维坦》，刘胜军、胡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拉什，2009，《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施坚雅，1998，《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维克多·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沃尔夫，2013，《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 张娟，2013，《让历史遗忘：中越边境上的战争与记忆》，未刊稿。

（责任编辑：杨渝东）

睦邻的交易：中越边境上的小规模贸易 及相互认知的型塑

恩迪斯*

摘 要：中越关系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正常化，边界两侧的民众也怀着对新投资机会或谋生机会的期待，开始涌进浮现中的“边境经济区”。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正式开放的边境贸易更触发了两国间货物和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加，之前寥落的甚至被废弃了的越南边界小镇市场变成了繁忙的商业中心，不但迎合了地方民众的需要，而且吸引着越南其他地区、中国和其他各国的游客。基于在边境口岸城镇——越南老街市——为期 6 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所收集的民族志材料，本文探讨了中越双方民众如何基于住在边界另一边的、隔壁的“他者”的那些在地化的、日常的经验以及与对方具体的互动中型塑出对对方的观感。更具体地说，笔者将审视以下三个主题：①越南籍（在当地是多数民族）小贩和中国商人对对方国家的情感和态度；②越南小贩与中国商人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习惯之间的差异；③竞争中的越南小贩用来争取中国籍和其他外国观光客的销售和定价策略。

关键词：中越边境 跨境贸易 贸易关系 相互观感 经济习惯 商业道德 旅游

综观越南历史，它与中国之间的“爱恨关系”可以说是最为持续久

* 恩迪斯（Kirsten W. Endres）博士，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原文为英文，由陈秀琪翻译。

远的主题 (SarDesay, 1989: 3; 转引自 Chan, 2009: 234)。越南曾是中国的藩属, 持续接受汉化的历史近千年之久 (Woodside, 1971; Pelley, 1995)。近来, 越南兴起了一种思潮, 主题即为“建构一个清楚连贯的越南人民的过去” (Chan, 2009: 235), 这种民族主义的内容, 不仅仅是颂扬“抵御外力入侵的传统” (Pelley, 1995: 234), 使之成为越南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还强调自身迥异于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及特色。而最近因南海诸岛领土纠纷而衍生的争论使得中越关系紧张并激起了舆情对于“贪婪的中国”领土扩张论者的反感。种种敏感性连同中国近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 形成了目前研究中越边境上小规模商业关系的脉络主体。

有关北部湾区域贸易历史的先行研究, 多关注数百年来该区的当地居民结构、商业交易网络以及文化交流 (Tana, 2012; Cooke, Tana and Anderson, 2011)。在帝国策略转型的表面上, 当地 (边界的) 临海社群“持续以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地方结盟并涉足当地商业” (Anderson, 2011: 93), 打造出连接海事与内路贸易的“次级商业区域”。本文顺着中国云南的经济走廊带, 将“次级商业区域”的概念扩展至内陆沿边地区。

老街市是老街省省会都市, 位于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以南, 与中国云南省河口以南溪河为界, 两城镇以桥 (越语称河口桥) 相通, 是中越两国国界三处边界关卡之一。在 1979 年短暂而激烈的战争中, 老街大部分毁于战火, 大多数的居民被疏散。^① 之后数年里, 关卡封闭, 老街市大半废置。随着中越两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关系的正常化, 边境渐渐从泾渭分明、剑拔弩张的邻居转型成重要的、活力四射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纽带。在边界的任一方, 境内移民预期到某种新的或更好的商机及出路而被吸引回流到新兴“边境经济特区” (Womack, 1994; Xiaosong and Brantley, 2000; Zhang, 2011)。小型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并顺应国家的调控转型。在打造新型边界贸易关系的同时, 中越两国凭借着深植于历史上的国家刻板印象、现行经济情势, 以及个人在经济交易中面对面交流经验的背景, 得以建构与塑造“国界另一头的他者”形象和认知。

基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合计 6 个月在老街中央市场田野调查期间收集

① 1960 年代越南新经济特区成立时, 老街就已经涌进当地低地部族 Kinh 移民。当边境战争爆发时, 他们多数回到家乡。与此类似的是河口的许多居民也离开小镇搬到内陆地区 (Zhang, 2011: 20)。

到的民族志资料，本文检视老街－河口国境交界处贸易关系以及在贸易实践中展现出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情绪与态度。^① 笔者特别关注的是三个交互关联的主题：①越南籍（在当地是多数民族）市场商贩及中国贸易商人对彼此国家的情绪与态度；②中越商人在“企业伦理”及商业实践上展现出的不同；③越南商贩针对中国和其他外国的游客采用的相互矛盾的销售手段及定价策略。本文并非为中越关系提供全面性的解析，而是探索相互认知如何经由当地与国界边上“他者”的日常互动经验而得以塑造成形。

一 共享的利益、杂陈的感觉

老街中央市场是该省规模最大的常设市场，截至 2010 年，有 705 位登记在案的商贩。因为货源充裕，这个市场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包括当地小镇居民、少数民族成员以及国外的游客。其中绝大部分的货物来自中国。从吹风机、手机（正版与山寨版）到平板电视、服装和纺织品、鞋、儿童玩具、提包手袋、家装风水物件……还有像手电筒、手推按摩器材、钥匙圈、发夹这些小商品。尽管商贩均了解中国的产品质量良好，但在市场中可见的却是很不耐用的次品。

中国的经济实力有目共睹。产品的低价和庞大规模、设计与形态的海量多样性，以及中国产品涌入世界市场的速度让人敬服的同时，也让人关注到越南经济的竞争力。除了在质量和耐用度方面有所欠缺外，越南商贩承认即使是优质的中国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售价仍然比本土自产的低廉。两国的低收入阶层对廉价品的需求依旧热度不减，然而涌入的消费者可能实际上更偏爱比越南和中国产业更发达的国家所制造的知名度高的品牌产品（Vann, 2003）。Thanh 先生这位木制手工艺品店的老板觉得：“中国人非常懂行。他们喜爱买木制工艺品留作纪念。因为在中国境内没有品种繁多的珍贵木头，一到越南，中国人便喜欢买上档次的产品，然而他们卖给我们的都是垃圾，好比这些只能用几年还影响环境及健康的塑料风水物件。”从积极的层面上说，商贩们都知道廉价质量差的产品（有些人用

① 关于认知与态度的观察笔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基于越南商贩的非正式对话与交谈，以及他们与老街中央市场的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互动。笔者借着偶尔到河口的拜访而能进一步完善所搜集的资料。除少数例外，交谈多采用越南语。特别感谢我的助理 Tam，他纯熟地捕捉田野对话者声调的技术使我在翻译文字时尽可能地贴近原意。感谢 Thao 和 Nghia 协助中文对话。本文通篇使用化名以保护对话者的隐私。

“以邻为壑”批评之）事实上能满足穷人的需要，不然他们无法享受时代进步、科学发达所带来的恩惠。在这点上，中国被认为对各阶层的福祉都作出了贡献。

中国在区域性经济方面主宰力也隐含优越/自卑感。“中国当局几乎没想过越南”，一位商贩抱怨说，“中国的百姓也是，他们都说，即使100年后，越南也不可能赶上中国”。通过流动性销售的形式为老街市场提供货源的中国人沈立先生认为，越南经济落后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越南逃漏税及走私的情况不胜枚举，这是让国家穷困，进而无法在基础建设方面充分投资的原因。相反地，中国在诸如道路建设之类的基础建设方面投资充裕，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就像房产税，中国正在进一步制定更严格的税法。然而在越南所有这些都付诸阙如！”沈立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不像越南那么严重。这个观点也为从事手机和壁钟销售的越南商贩Duy先生所赞同，他举例说，像人民工作勤奋而且聪敏的事实为何没有为越南带来更快速的发展这样的问题，他提及“款项挪用与贪腐猖獗的程度比中国严重。在越南贪婪就像一种传染病”。

与中国生意伙伴和商贩的交流触发了越南社群在各议题上的自我反省。在女性市场商贩中，家庭事件和性别不平等是特别能引发争论的主题。在私下的交谈中，很多女性表达了她们对中国男性所展现出的礼貌举止和文明行为的欣赏。有些人甚至认为，相较于越南男性，中国男性是她们比较中意的潜在的丈夫人选。Phuong这位40多岁的女士很执着地表示，“在中国性别关系平等得多。中国男士以更尊敬人的方式对待女性。越南男性落伍，心胸狭隘，像只坐井观天的青蛙，他们所看到的天空跟炒锅盖一样大！”^①一位39岁已离异的纪念品小商贩也支持这个观点：“说实话，我受够了越南男人，他们在外游荡完了，回家后像个懦夫般地殴打妻子和孩子。反观中国老公们，不管是职员还是大老板都惧内，一下班就回家煮饭、打扫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然而，越南商贩也很清楚，正所谓“隔壁家的草不见得都长得好”。首先，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集中在特定地区，还没能触及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内陆贸易区，但是据说越南在这方面的普及程度较高。其次，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不断加剧的就业困难（越南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是中国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下不可避免的另外一面。

^① 见Grillot（2011）对越南女士的中国人观感的准确阐释及分析。